

【学习要点】

1. 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朝政府的统治，建立了中华民国，但是并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浴血奋战，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

2. 民国时期，虽然局势动荡，但新疆一直处于中央政府的管理之下。中国共产党人进入新疆后，始终引领着新疆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方向，并最终带领新疆各族人民迎来了和平解放。

3. 新疆各族人民团结一致，掀起了一次次反帝爱国斗争，同全国人民一道共赴国难，表现出强烈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4. 民国时期，新疆地区经济整体发展缓慢，初步建立起了工业体系。在中国共产党人的有力推动下，新疆工农业有了一定的发展。

5. 新疆各民族文化开始向现代转型，尤其是中国共产党人进入新疆后，促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广泛传播，各民族的祖国认同和中华文化认同达到新的高度。

6. 新疆地区依旧延续了以伊斯兰教为主、多种宗教并存的格局。虽然受“泛伊斯兰主义”错误思潮的影响，伊斯兰教与其他宗教的关系出现过短暂的紧张局面，但并没有改变新疆多种宗教和谐共处、交融共存的格局。

第一节 我国多民族大一统格局的新趋势

在孙中山的领导和影响下，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推翻了清朝封建专制统治。但胜利果实很快被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北洋军阀所窃取，全国陷入军阀割据混战，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依然沉重地压在中国人民身上。中国共产党肩负起带领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重任，彻底结束了旧中国一盘散沙的局面，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中国共产党是近代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

一、北洋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的中国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宣告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并未改变旧中国的社会性质和人民的悲惨境遇。袁世凯趁机窃夺政权，背叛共和，公然复辟帝制。他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反抗，最终在护国战争的炮声中败亡。之后，北洋军阀分裂为直、皖、奉三大派系，其他各省也被大大小小的军阀所控制。这些军阀为了争夺中央政权，保持和扩大自己的地盘，不惜出卖国家利益，依附帝国主义。在大小军阀连年混战、割据纷争的动乱中，中国人民开始重新考虑出路问题。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苦苦探寻救亡图存出路的中国人民指明了前进方向。五四运动的爆发，标志着中国工人阶级开始登上政治舞台，马克思列宁主义开始与中国工人运动结合起来。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胜利召开。8月初，中共一大在浙江嘉兴南湖的一条游船上胜利闭幕，庄严宣告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中国革命的面貌从此焕然一新。中国共产党在挽救民族危亡、实现民族复兴的时代召唤中，走到了历史的前台，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主心骨。

1924年，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展开合作，进行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运动。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和工农革命运动的猛烈高涨，给帝国主义在华侵略势力和北洋军阀反动统治以致命打击。在此期间，高涨的工农革命运动触动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蒋介石、汪精卫等国民党右派在帝国主义势力支持下，先后背叛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
上海市望志路106号（现兴业路76号），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



浙江嘉兴南湖红船 1921年8月初，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此胜利闭幕。“红船精神”在这里孕育。

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的命运早已同中国共产党的命运、中国人民的命运、中华民族的命运紧紧连在一起，它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在中国得到了充分检验，它的人民性和实践性在中国得到了充分贯彻，它的开放性和时代性在中国得到了充分彰显！马克思主义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使中国这个古老的东方大国创造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发展奇迹。历史和人民选择马克思主义是完全正确的，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是完全正确的，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完全正确的！

革命，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轰轰烈烈的国民革命失败了。1928年12月，张学良宣布“易帜”，南京国民政府在名义上统一了全国。此后，国民党不断强化独裁专制统治，而中国共产党带领工农大众，创建红军，建立民主政权，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开始进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斗争。

1931年9月18日，日本侵略者发动了九一八事变，挑起了侵华战争，这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在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中国共产党率先举起了武装抗日的旗帜，担负起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历史重任，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1937年7月7日，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又称卢沟桥事变）爆发了。七七事变是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也是中国全民族抗战的开端。在正面战场，中国军队组织多次战役，抵抗日军侵略；在敌后战场，中国共产党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根据地，开展人民游击战，这些都为抗战的最后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经过长达14年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国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关键。

抗战胜利后，中国人民普遍期待和平建设国家。中国共产党为争取和平、民主做出很大努力，但国民党坚持独裁统治，并于1946年发动全面内战。中国共产党领导解放区军民，先后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之后展开战略反击，发起三大战役，解放南京，结束了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人民解放战争胜利结束。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终于推翻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推翻了帝国主义、

资料链接

1945年9月2日上午，同盟国联合受降典礼在停泊于东京湾的美国军舰“密苏里”号上举行。日本政府代表和同盟国代表分别在投降书上签字，美国、中国、英国、苏联、法国和荷兰、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等国代表在日本投降书上签字确认，接受日本投降。至此，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结束，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了完全胜利。2014年2月27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确定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的决定》，确定每年9月3日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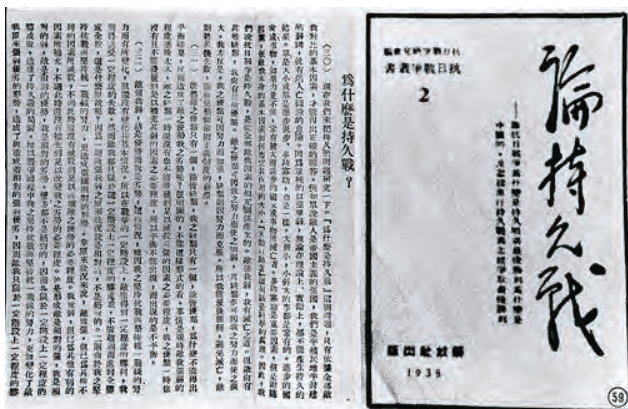
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开启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新纪元。

二、中华民族精神的升华

近代以来，中国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进行的一系列抗争，既是中华民族觉醒的历史进程，也是中华民族精神升华的历史进程。

鸦片战争以后，由于列强入侵和封建统治腐败，中国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特别是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野蛮入侵，使中华民族濒临亡国灭种的境地。日本侵略者从国民党政府手中相继夺去大部分重要城市，占领了东北、华北、华中、华南大片土地。据不完全统计，在日本侵略军的屠刀下，“中国死伤人数3500万，仅南京大屠杀就死亡30万人以上”，“按1937年的比值计算，日本侵略者给中国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1000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5000亿美元”^①。日本侵略者对中国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成为人类历史上最野蛮、最残酷的一页。面对民族存亡的空前危机，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像火山一样迸发出来。全体中华儿女众志成城、共御外侮，为民族而战，为祖国而战，为尊严而战，汇聚起气势磅礴的力量。中国人民抱定了“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的决心，抱定了血战到底、抗战到底的信念，谱写了惊天地、泣鬼神的爱国主义篇章。“在中国人民抗日

^① 江泽民：《在首都各界纪念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五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1995年9月3日）》，《人民日报》，1995年9月4日第1版。



1938年刊印的毛泽东《论持久战》书影

战争的壮阔进程中，形成了伟大的抗战精神，中国人民向世界展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伟大的抗战精神，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永远是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为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强大精神动力。”^①

在中华民族反抗外来侵略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像抗日战争这样，民族觉醒如此深刻，民族团结如此广泛。“这个战争促进中国人民的觉悟和团结的程度，是近百年来中国人民的一切伟大的斗争没有一次比得上的。”^②1939年，顾颉刚在《中华民族是一个》一文中开宗明义指出：“凡是中国人都是中华民族”，汉族要和“边地人民共同集合在中华民族一名之下，团结起来以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这是我们的正理！也是我们的大义！”“我们所以要抗战为的是要建国，而团结国内各种各族，使他们贯彻‘中华民族是一个’的意识，实为建国的先决条件。”^③正如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所指出的：“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④随着七七事变爆发，中国共产党倡导并积极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国民党摒弃前嫌再度握手，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中华儿女开始从一盘散沙、内战频仍到万众一心、共赴国难。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大大促进了中华儿女的民族认同感、凝聚力和向心力，大大增强了中国人民为民族前途和命运抗争的意识，更加坚定了中国人民对民族独立、自由、解放的追求。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鼓舞着中国人民走出幽暗的历史低谷，重新找回民族的自尊与自信，在爱国主义旗帜的感召下走向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

① 习近平：《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9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2014年9月3日）》，《人民日报》，2014年9月4日第2版。

②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论联合政府》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32页。

③ 顾颉刚：《中华民族是一个》，《益世报·边疆周刊》（昆明）第9期，1939年2月13日。

④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论持久战》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11页。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新疆的和平解放

民国时期，全国处于动荡之中，英国、日本、土耳其等外国势力也对新疆进行渗透与侵略，但新疆始终处在中央政府的管理之下，始终是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各族人民团结一心，同各种分裂势力进行坚决斗争，维护了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中国共产党人到新疆后，肩负起引领新疆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历史重任。在党中央的运筹帷幄下，新疆实现了和平解放。

一、北洋政府与南京国民政府对新疆地区的统治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全国各地纷纷响应。1911年底至1912年初，新疆积极响应辛亥革命，相继爆发迪化起义和伊犁起义，同全国人民一道推翻了封建帝制。1912年1月初，以杨缵（zuǎn）绪为首的革命党人在伊犁发动起义成功，成立新伊大都督府。5月，北洋政府任命杨增新为新疆都督，主持与伊犁革命党人的和谈。7月，新、伊双方签订议和条款，撤销新伊大都督府，承认杨增新主持新疆军政。在北洋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新疆先后经历了杨增新（1912—1928年主政）、金树仁（1928—1933年主政）、盛世才（1933—1944年主政）以及国民党统治新疆时期（1944—1949）。

民国时期，新疆始终处在中央政府的管理之下。杨增新主政时期，北洋政府变动频繁，但不管谁上台，杨增新一律通电拥护，始终将新疆置于中央政府管理之下。他常说，新疆脱离中央等同自杀。科阿战争时，杨增新接到北洋政府“派兵赴援”的电令后，立即派兵支援。俄国曾对杨增新出兵支援进行指责，杨增新针锋相对地说：“科布多为中华民国领土，即

史料回放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震撼全国，各省纷纷响应。12月27日，在新疆的革命党人刘先俊、田昔年等联合哥老会在迪化首先举义，进攻抚台衙门，为清巡抚袁大化所挫，暂告失败。

——邓宝珊《伊犁革命回忆录》

资料链接

阿山归并新疆既蒙核准，此次周务学带队前往办理善后，应俟将阿山兵变查办完竣后，拟即废除长官名义，并请任命周务学署理阿尔泰道尹一缺。先由新疆刻一木质关防，发交周务学暂行启用任事，一面将善后办清，划分长官、道尹界限，不相牵混；一面组织道尹机关，分科办事。并设外交局隶于道尹，期与俄领可以有事接洽。

——杨增新《补过斋文牍·丙集上·建设编上》

清朝初年，阿尔泰属科布多参赞大臣管辖。清朝末年，设阿尔泰办事大臣。民国初年，改称办事长官，直隶中央。1919年4月，中央政府国务院会议决定改阿尔泰办事长官辖区为道，并归新疆辖制，撤销了阿尔泰办事长官，6月正式任命周务学为署理阿尔泰道尹。

在本国大总统施行政治权范围以内。现在该处出有乱事，本都督迭奉本国大总统命令派队往援，是本国政府为平定内乱起见，与贵国毫无关系。”^①金树仁上任伊始，即向南京国民政府报告新疆的情况，南京国民政府电令金树仁根据省政府组织法组建新疆省政府。金树仁将新疆省政府人选名单报送中央，得到中央政府的批准。^②盛世才主政新疆时表示，新政府保障新疆永远为中国领土，要密切新政府与南京政府之间的关系，新政府的政治路线全部建立在中央政府的政治路线上。1944年8月29日，国民党政府发表改组新疆省政府令，新疆军政首脑开始由国民党政府直接委派。

民国时期，新疆的行政建制工作不断推进，逐渐与内地趋于一致。1913—1914年，北洋政府宣布废除府级行政建制，确立了省、道、县三级地方行政体制。杨增新依照中央政府规定，废除旧有的府，推行道、县制。而阿尔泰则因科布多失陷之后，面临“孤悬新疆之外，地僻势孤，侵略势力环伺左右”的紧迫局势，杨增新呈请北洋政府并获批准后，于1919年4月25日将阿尔泰归入新疆管理，并改为阿山

^① 杨增新：《补过斋文牍·丁集下·照覆俄领派队援科是中国平定内乱与俄国毫无关系文》第2辑，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197页。

^② 白振声、[日本]鲤渊信一主编：《新疆现代政治社会史略》，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44—148页。

道，从而增强了新疆整体抵御外敌的实力，维护了中国领土完整和新疆稳定。1920年，新疆又增设焉耆、和闐两道，至此全疆共有8个道，51个县；1930年，金树仁主政时期，南京国民政府在全国实行省、县两级制，新疆将8个道改为8个行政区，继续增设县治；盛世才主政时期，又于1934年和1942年分别添设哈密行政区和莎车行政区。1943年，新疆将行政区改为专区，新疆设县治的城市已达到74个，专区增加到10个；国民党统治新疆时期，仍然设10个专区，新增5个县。新疆和平解放前，全疆共10个专区，下辖79个县市。从1912年至1949年，中华民国新疆省各级军政机构设置，虽参酌边疆情形有所变通，但总体上仍是遵照中央政府的有关法规、规定办理，变通之处也必经中央政府核准，充分体现了中央政府对新疆一脉相承的统辖关系。

民国建立后，虽然封建帝制被推翻，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并没有改变，并因此催生了军阀割据的畸形社会形态。杨增新、金树仁、盛世才封建军阀以及国民党统治时期，各族人民深受剥削压迫。新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后，应盛世才邀请，大批共产党人进入新疆，积极宣传抗日救国，团结和教育了各族群众，使中国共产党在新疆的影响日益扩大。中国共产党人引领着新疆地区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方向，在支援抗战、保障国际交通线畅通、建设新疆、教育群众、播撒革命火种等方面作出了卓越贡献，新疆社会面貌焕然一新，为新疆和平解放奠定了基础。

二、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疆的活动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自诞生起，就始终关注着新疆，并自觉肩负起了唤起民众中华民族意识觉醒，把新疆各族人民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政治经济压迫下解放出来的历史重任。

20世纪30年代中叶，苏联和共产国际先后派出数批在苏联学习和工作的中国共产党人，以联共党员身份到新疆帮助盛世才工作。1936年4月，在共产党人的帮助下，盛世才制定了“反帝、亲苏、民平、清廉、和平、建设”六大政策。1937年4月，以迎接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余部进入新疆为契机，中国共产党开始同盛世才建立统战关系。陈云出任中共中央第一任驻新疆代表。中央为加强新疆工作，决定在迪化设立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对外称“第三招待所”，滕代远为负责人。新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建立。



红军西路军进疆纪念碑
位于新疆哈密



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纪念馆
位于新疆乌鲁木齐

1937年起，应盛世才邀请，中共中央经慎重考虑，选调大批干部帮助盛世才工作。邓发（化名方林）、毛泽民（化名周彬）、汪小川（化名汪哮春）、黄火青（化名黄民孚）、林基路（原名林为梁）、陈潭秋（化名徐杰）等160多名共产党干部和家属陆续来到新疆，被分派到新疆行政、财政、民政、文化、教育、新闻及群众性政治团体等单位担任各种职务。他们广泛发动群众，为支援抗战和稳定新疆做了大量工作。毛泽民在担任新疆省财政厅副厅长期间，对财政金融体制进行改革，主要包括改组新疆省银行、推行币制改革、发行建设公债等，使新疆一度出现金融稳定、市场繁荣的可喜景象。1938年，反帝会在进行第二次改组后，任命共产党员黄火青为秘书长，开始大量建立由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为主要负责人的分会，其机关刊物《反帝战线》刊登了许多关于马列主义的文章，用革命思想团结和教育新疆各族人民。为了支援抗日前线，反帝会发起了声势浩大的“募金和募集寒衣运动”。在林基路等共产党人和爱国进步教员的培养和影响下，新疆学院面目一新，成为一所充满革命朝气的学校，一批有志青年学生迅速成长起来，并走上革命道路。自从共产党人担任负责人后，《新疆日报》开始大量刊发来自延安的红色电讯，刊发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的多篇文章，宣传抗日救国，传播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1939年，赵丹等一批文艺工作者来到新疆，他们以组织歌咏、演出话剧等形式宣传抗战，在社会各界引起巨大反响，赢得了各族人民的普遍信任、拥护和支持。

抗战时期，日寇封锁了我国的海岸线和滇缅公路，外国援华物资只能通过新疆等地区运入内地，送往抗战前线。新疆成为抗战时期的大后方和重要的国际交通线，担负着支援全国抗战的重大使命。“据苏联方面统计，1937年10月至1939年8

资料链接

陈潭秋（1896—1943），湖北黄冈人。青年时代积极参加五四运动。1920年秋，他和董必武等人在武汉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7月出席党的一大。1939年9月奉命任中共中央驻新疆代表和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负责人。1943年9月27日被反动军阀盛世才秘密杀害于狱中，时年47岁。



陈潭秋像

毛泽民（1896—1943），湖南湘潭人，毛泽东之弟。1921年参加革命，1922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爆发后，毛泽民于1938年2月赴苏联治病途经新疆时，应盛世才请求，经中共中央批准，留新疆工作，化名周彬，任新疆财政厅副厅长。1943年9月27日被反动军阀盛世才秘密杀害，时年47岁。



毛泽民像

林基路（1916—1943），广东台山人。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受党中央派遣赴新疆，先后担任新疆学院教务长、库车县县长、乌什县县长。1943年9月27日被反动军阀盛世才秘密杀害，时年27岁。



林基路像

月，苏联提供给中国政府的军事物资有：飞机985架，坦克82辆，大炮1317门”，“1938—1940年苏联政府向中国政府先后派出军事顾问140人，先后来华的志愿军航空人员2000余人，均从这条国际交通线通过”^①。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努力下，这条国际交通线畅通无阻，国际援华物资源源不断从这条交通线运往前线，有力地支援了抗日战争。

德国法西斯入侵苏联后，盛世才投靠了国民党蒋介石。1942年3月，盛世才炮制所谓“阴谋暴动案”，大肆搜捕和迫害在新疆的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一年后，盛世才指令秘密杀害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驻新疆代表陈潭秋和毛泽民、林基路等同志。新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此破裂。

被盛世才逮捕的中共人员继续在狱中进行英勇顽强、大义凛然的斗争，反抗迫害、反对暴行。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影响下，新疆一代革命青年在成长。中国共产党人被捕后，一些进步学生和革命青年开始组织秘密的进步团体，在物质上和精神上支援在狱中的中国共产党人。中共中央为营救在新疆的中共人员，曾多次向国民党交涉，为释放中共人员做了大量工作。在中共领导人周恩来等人的关心和帮助下，1946年6月，131名中国共产党人得以释放，并最终胜利回到延安，受到党政军的隆重欢迎和亲切慰问。

三、新疆和平解放

民国时期，封建军阀以及国民党反动派对新疆地区进行残酷统治，各民族内部封建势力与之相互勾结、狼狈为奸，帝国主义向新疆扩张势力范围，这些都严重阻碍了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各族人民深受剥削压迫、贫困苦难的煎熬。推翻封建军阀和国民党反动统治、驱逐帝国主义势力，成为新疆各族人民的根本要求。1944年8月至1949年10月，新疆伊犁、塔城、阿山（今阿勒泰）3个地区维吾尔、哈萨克等各族群众发起反对军阀、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和帝国主义侵略的武装斗争，通常称之为三区革命。

这场斗争历时5年，以1946年6月新疆联合省政府成立为界线，大体划分为

^① 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党史研究室著：《中共新疆地方史》，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7—48页。

两个时期。前期为1944年8月至1946年6月，由于缺乏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由于苏联别有用心的干预，混入革命队伍的民族分裂主义分子一度窃取领导权，煽动民族对立，建立分裂政权，犯有民族分裂的严重错误。苏联别有用心的干预，是三区革命误入歧途的重要原因。后期为1946年6月中旬至1949年10月，在中国共产党影响下，以阿合买提江、阿巴索夫等为代表的进步力量掌握了三区革命领导权，于1946年废弃“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旗号，主动与中国共产党联系，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把三区革命引向正确轨道，汇入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洪流。

三区革命是反抗封建军阀、国民党反动统治、帝国主义侵略的武装斗争，与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性质、对象和目标相同，从本质和主流看，是全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一部分。三区革命推翻了国民党在三区的反动统治，打击和动摇了国民党反动派在新疆的统治地位，牵制了国民党10万军队，有力支援了全国特别是西北的解放战争，为新疆和平解放、维护祖国统一作出了重要贡献。必须充分肯定阿合买提江、阿巴索夫等三区革命主要领导人的历史贡献。

1949年，全国解放战争进入尾声，解放新疆提到议事日程。同年3月，在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上，党中央对解放新疆问题作了周密部署，决定派王震部进军新疆。中共中央通过张治中、屈武等人，对国民党驻新疆的陶峙岳、包尔汉和刘孟纯等军政要员做工作，劝他们根据形势发展共商对策，走和平起义的道路。^①1949年8月14日，中共中央派邓力群以联络员的身份从莫斯科进入新疆伊犁，与三区革命领导人会面，了解三区情况，确定参加新政协人员名单；9月15日，邓力群进入迪化，同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新疆省政府主席包尔汉商谈新疆和平解放问题。在此期间，建立了“力群电台”，为党中央随时掌握新疆各方面情况，领导新疆和平解放提供了重要决策依据。

1949年8月，应中共中央邀请，三区派阿合买提江、阿巴索夫等5人作为新疆代表参加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飞机不幸失事，机上人员全部遇难。9月，三区改派赛福鼎、阿里木江、涂治3人作为代表参加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

鉴于陶峙岳、包尔汉等决定和平解决新疆问题，张治中也答应帮助解决新疆

^① 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党史工作委员会编：《新疆和平解放》，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5页。

陶峙岳将军及所属部队将士们、包尔汉主席及所属政府工作人员们：

你们在9月25日及26日的通电收到了。我们认为你们的立场是正确的，你们声明脱离广州反动残余政府，归向人民民主阵营，接受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领导，听候中央人民政府及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处置，此种态度符合全国人民的愿望，我们极为欣慰，希望你们团结军政人员，维持民族团结和地方秩序，并和现在准备出关的人民解放军合作，废除旧制度，实行新制度，为建立新新疆而奋斗。

——新疆宣布和平起义后，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于9月28日复电嘉勉。

问题，中共中央认为“新疆已不是战争问题，而是和平解决的问题”。9月10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要求“集中注意力争取于十一月初、中旬由玉门向新疆进军”，“应设立西北军政委员会，统辖西北五省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工作”。^①9月26日，毛泽东再次致电彭德怀，待新疆和平解放后，“就边区政府基础成立西北军政委员会，彭（彭德怀）为主任，习仲勋、张治中为副主任”^②。当时负责西北五省工作的仍是中共中央西北局，彭德怀、贺龙、习仲勋分别担任第一、第二、第三书记。由于彭德怀在前线指挥第一野战军，挺进甘肃、宁夏、青海、新疆等地，贺龙奉中央之命，筹备率军入川事宜，因此这一时期，中共中央西北局实际上由习仲勋主持全盘工作。在复杂的形势下，习仲勋主持完成了接管旧政权、安定社会秩序、支援西北前线等各项工作。^③

1949年9月25日，在人民解放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形势下，在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推动下，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发布起义通电；9月26日，新疆省政府主席包尔汉也发布省政府起义通电。10月1日，毛泽东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结束了一百多年来中华民族被侵略、被奴役的屈辱历史，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编：《新疆工作文献选编（一九四九——二〇一〇）》，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6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编：《新疆工作文献选编（一九四九——二〇一〇）》，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10—11页。

③ 《习仲勋传》编委会编：《习仲勋传》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页。

开辟了中国历史新纪元。

尽管陶峙岳等宣布起义，新疆得以和平解放，但新疆社会局势并不安稳，仍有特务分子及少数反动军官制造叛乱、烧杀抢掠、残害百姓。客观形势要求人民解放军必须加紧准备，火速入疆，以巩固起义成果，使新疆人民真正获得解放。1949年9月27日，正在筹划进军新疆的彭德怀从兰州向习仲勋发来电报：“入新部队经费无着。祁连山及西宁周围山上最近已全部降雪，棉衣运不到，冻病者不少。西北除汉中外算是全部宣布解放，因此各项工作须有一个全盘（五省）筹划，尤其是经济建设。”10月10日和17日，习仲勋又先后接到彭德怀从甘肃酒泉发来的电报：“新疆和平解决已经



新疆各族人民欢迎人民解放军进疆



1949年12月17日，新疆党政军领导和各族代表在入城式阅兵台上检阅部队。彭德怀（前中）、王震（右二）等向受阅部队敬礼。



1950年1月19日，西北军政委员会成立合影。（彭德怀一排左三、习仲勋一排左二）

大体成功。第三军拟于十月二十日后南移到天水附近集结……”“以现有汽车严冬前运兵南疆甚为困难。如严冬前我军不能到达目的地，今冬即不可能筹备来春生产。为克服困难，兰州、西安须尽可能集中较好的车子带汽油来酒泉。”面对西安、兰州等地经济困顿、灾情严重的实际情况，习仲勋组织和动员各方面力量，在做好群众工作的基础上，千方百计通过各种方式筹集军需供给，确保了支前任务的完成。^①

1949年11月8日，中共中央新疆分局成立。12月17日，经中央人民政府批准，新疆军区和新疆省人民政府宣告成立，彭德怀为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第一副司令员王震，第二副司令员陶峙岳，第三副司令员赛福鼎·艾则孜；包尔汉任新疆省人民政府主席，高锦纯、赛福鼎·艾则孜任副主席。

新疆和平解放后，正式组建西北军政委员会的时机已经成熟。1949年11月17日，中共中央西北局扩大会议在兰州举行，决定以彭德怀为主席，习仲勋、张治中为副主席，领导西北军政工作。1949年12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讨论并通过了政务院提议的华东、中南、西北、西南军政委员会主要负责人员的任命名单。12月16日，政务院第十一次政务会议通过了《大行政区人民政府委员会组织通则》，规定大行政区军政委员会既是各该区所辖省（市）高一级的地方政权机关，又是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领导地方政府工作的代表机关。1950年1月19日，西北军政委员会在西安成立，彭德怀任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习仲勋、张治中任副主席。习仲勋在大会上讲话，表示“我们深信建设新的大西北的光荣事业是一定会成功的”^②。从此，新疆在中共中央及西北军政委员会的领导下，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

第三节 新疆各族人民捍卫国家统一的斗争

在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奋斗中，新疆各族人民与全国人民一道奋起反抗，共赴国难，团结一致，众志成城，与民族分裂势力坚决斗争，捍卫了国家统一和领土完

^① 《习仲勋传》编委会编：《习仲勋传》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8页。

^②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习仲勋文集》上卷，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年版，第151页。

整，结成了休戚相关、荣辱与共的关系，共同谱写了可歌可泣的爱国主义篇章。新疆各族人民与全国人民相互依存，相互交织，相互交融，铸就了牢不可破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一、民国时期新疆民族分布格局的变动

民国时期新疆主要民族的分布状况基本上延续了清代的格局，只是一些民族的分布地区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并在汉文中对一些民族的称谓作了规范。

维吾尔族分布在天山南北。1934年，新疆省发布《新疆省政府令改缠回名称为维吾尔布告》，决定统一使用“维吾尔”作为汉文规范称谓，意为维护你我团结，首次精确表达了 Uyghur 名称的本意。

20世纪20—30年代，大批来自陕西、甘肃、湖南、湖北、天津等地的汉族迁至新疆。“据哈密关卡报告，内省人民相率来新者日计百数十人，络绎不绝。”^①抗日战争时期，迁入新疆者尤多。

清末民初，有不少哈萨克人从塔城、阿勒泰等地迁往今昌吉、乌鲁木齐南部山区以及巴里坤等地。1916—1933年，中亚地区先后有大批哈萨克、柯尔克孜族牧民因多种原因迁入新疆地区，仅1916年就有15万柯尔克孜人进入今新疆伊犁、乌什、阿克苏、伽师、喀什等地。1917年十月革命后，大批沙俄白卫军残部及难民开始进

资料链接

维吾尔族是经过长期迁徙、民族融合形成的。维吾尔族先民的主体是隋唐时期活动在蒙古高原的回纥人，曾经有乌护、乌纥、袁纥、韦纥、回纥等多种译名。788年，回纥统治者上书唐朝，自请改为“回鹘”。元明以来，关于维吾尔的族称，史籍又多以近音译称。除了“回纥”“回鹘”外，《元史》又写作“畏吾”“畏兀儿”“畏吾儿”。清代称其为“缠回”“回部”。民国初期继续沿袭清代的称呼。1934年，新疆省发布政府令，决定统一使用“维吾尔”作为汉文规范称谓。

^① 杨增新：《补过斋文牍·甲集上·呈覆内地流民资送新疆不无窒碍文》第1辑，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01页。

入新疆。后来，有相当数量的俄罗斯人在新疆伊犁、塔城、迪化等地定居下来。

民国初期，有数万来自陕西、甘肃、宁夏的回族人入疆。20世纪30—40年代，进入新疆的回族大多是随军而来，以迪化、乾德（今新疆乌鲁木齐市米东区）、伊宁等地人数较多。

民国时期，新疆蒙古族的分布基本沿袭了清代统一新疆后的格局。1919年，阿尔泰划归新疆管辖，当地的蒙古族也成为新疆蒙古族的一部分。

二、新疆各族人民反抗外来侵略和反对民族分裂主义的斗争

在封建军阀和国民党统治下，新疆内忧未解，外患频仍。英国在喀什建立领事馆，日本等侵略势力也寻找各种途径进行渗透。在这些外国势力中，沙俄先后策动外蒙独立、挑起科阿战争、入侵阿尔泰、制造策勒村事件等，其间还有白俄因内战窜扰边境等事件，严重危害了我国的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面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新疆各族人民团结一致，奋起反抗，掀起了一次次轰轰烈烈的反帝爱国斗争。

1912年，在新疆于阗县策勒村爆发了震惊中外的“策勒村事件”。策勒村即今策勒县，当时是于阗县管辖的一个行政村。赛义提·阿吉，原系和阗县人，自称中亚安集延人，曾在沙俄间谍机构受过特殊训练，在策勒村为非作歹，欺压百姓，甚至非法发展俄侨，气焰十分嚣张。策勒村的广大群众深受赛义提·阿吉之苦。伊犁起义成功后，以维吾尔族农民苏普尔格为首的17名策勒村村民到于阗县衙控告赛义提·阿吉等伪造、强迫民众加入俄籍等种种恶行。叶尔羌参将熊高升赴于阗策勒村调查并处理此事。但赛义提·阿吉并未把熊高升等人放在眼里，他武装了近百名假“俄侨”，在其岳父的院内公然悬挂沙俄国旗，疯狂叫嚣与熊高升等人开战。当熊高升派勤务兵周树棠带三人去传讯赛义提·阿吉时，他不但不听传讯，反而率众打死打伤了周树棠等人。怒不可遏的策勒村人民从四面八方包围了大院，一把火焚烧了其巢穴。村民们一举捣毁了沙俄非法设立的商务机构，关闭了沙俄开办的所谓俄籍学堂。事件爆发后，和阗地区的各族民众纷纷积极声援策勒村人民的爱国行为。俄国驻中国喀什领事索柯夫借此向中国政府提出抗议和种种无理要求。袁世凯迫于压力，对沙俄政府提出的无理要求一一承允。在喀什，对策勒



策勒村事件纪念馆 位于新疆策勒县



新疆民众反帝联合会组织的抗日活动

村事件中的中国人进行“审判”时，苏普尔格说，策勒村“是我们中国的土地，不存在闯入不闯入的问题。赛义提·阿吉加入了俄国国籍，他从俄国的安集延窜到我们中国的策勒来干坏事……他私藏武器，枪杀中国人，对抗我们中国政府，难道没罪？”“赛义提·阿吉首先开枪打死我们中国人，我看该枪决的是赛义提·阿吉，而不是苏普尔格！”^①策勒村事件完全是沙俄侵略者一手造成的。一名沙俄军官供认，驻喀什噶尔领事索柯夫想要把南疆变成沙俄的一个省，因此才成百成千

地登记伪造俄国侨民，所以才有了策勒村事件。策勒村事件是在革命党人带领下，以维吾尔族人民为主进行的反对俄国侵略的爱国行动。尽管策勒村事件在袁世凯卖国政权的屈辱处理下结束，但新疆各族人民的反帝爱国斗争从未停止。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新疆各族人民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为建设抗战大后方、开展抗日捐献、保障国际援华交通线畅通作出了重要贡献。新疆各族人民开展节约活动、劳动竞赛和推销公债活动，促进新疆建设，巩固抗日后方；发动群众募捐，积极支援抗日前线。在中国共产党人的领导下，新疆出现了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团结抗战的新局面。国际上尤其是苏联援助中国抗日战争的大批军火、物资、药品和各种军事人员通过新疆源源不断到达抗战前线。

19世纪末20世纪初，“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错误思潮传入新疆地区。“泛伊斯兰主义”是19世纪中叶产生于一些伊斯兰教国家的一种社会思潮，主张将所有信仰伊斯兰教的国家和民族联合起来，建立政教合一的“大伊斯兰帝国”。“泛

^① 余骏升主编：《新疆文史资料精选·“策勒村事件”的调查报告》第1辑，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6页。

我国历史上从来没有把新疆称为“东突厥斯坦”，更不存在什么“东突厥斯坦国”。这一概念是欧洲人独撰的。18世纪至19世纪上半叶，随着西方对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各种语言的划分，俄国和欧洲一些学者和作家频繁使用“突厥斯坦”指代天山以南到阿富汗北部，大体包括新疆南部到中亚的地域，并且习惯以帕米尔高原为界，将这一地理区域分为“西突厥斯坦”和“东突厥斯坦”。19世纪后半期，俄国人将被其吞并的中亚地区命名为“俄属突厥斯坦”或“突厥斯坦”。19世纪末20世纪初，“泛突厥主义”“泛伊斯兰主义”错误思潮传入以后，境内外分裂势力将这个地理名词政治化，将其内涵扩大化，鼓噪所有使用突厥语族语言和信奉伊斯兰教的民族联合起来，组成政教合一的“东突厥斯坦国”。所谓的“东突厥斯坦”论调，成为国内外民族分裂势力企图肢解中国、谋求新疆“独立”的政治工具和行动纲领。

“突厥主义”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一思潮宣传“突厥人是同一个民族”，鼓吹亚洲西部和中部地区所有突厥语族民族联合起来，试图建立一个以奥斯曼土耳其为核心的“大突厥帝国”。受“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错误思潮的影响，民族分裂势力大肆编造歪曲新疆历史、鼓吹民族分裂。从20世纪初至40年代末，在外国敌对势力的怂恿、支持下，民族分裂势力多次制造动乱。1933年，民族分裂势力建立了所谓的“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20世纪40年代，新疆三区革命后围绕“东突厥斯坦共和国”问题进行了激烈斗争。

近代以来，随着中国步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新疆存在着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与各族人民大众的矛盾，同时存在着新疆各族人民和民族分裂势力的矛盾，这三种矛盾引发了一系列不同性质的斗争。一是抵抗外来侵略的斗争。比如，1855年，塔城各族人民火烧沙俄贸易圈；1865年，新疆各族人民反抗阿古柏侵略；1871年，新疆各族人民反抗沙俄侵占伊犁；新疆各族人民支援抗战等。二是反抗阶级压迫与分裂割据活动交织在一起的斗争。比如，19世纪60年代爆发了遍及全疆的以维吾尔、回等民族为主体反抗清朝封建压迫的农民斗争，但被一些封建领主和宗教头目篡夺领导权。他们竭力煽动民族仇杀，建立地方割据势力，把以反封建开始的农民斗争蜕变成了封建主之间的大混战。三是民族分裂活动。新疆近

资料链接

民族分裂主义，不论发生在哪里，都是我国稳定和发展的严重祸害，都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敌人。民族分裂主义的本质是，反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制度，分裂祖国，破坏各族人民大团结。各地区各部门都要从维护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政治高度，统一思想认识，加强工作协调。对民族分裂主义分子的违法犯罪活动，要及早发现，从严从快予以打击，露头就打，坚决制止在萌芽状态，绝不能手软。如果让他们搞起来，必然后患无穷。

代史上的分裂政权虽然覆灭了，但分裂和反分裂斗争在新疆一直相当激烈，始终没有停止过。

由于新疆多民族多宗教并存、多种势力渗透的特殊性，三种不同性质的矛盾和斗争往往交织在一起，我们必须客观、全面、辩证地分析和判断，把它们区分开来。对于抵抗外来侵略的斗争，要看到各族人民并肩作战，有力维护了中华民族共同利益，维护了祖国统一，必须充分肯定。对于反抗阶级压迫的斗争，要看到这是阶级压迫、阶级剥削的必然结果，各族人民的抗争是正义的，必须予以肯定和歌颂。对于民族分裂活动，要看到他们的本质是分裂祖国、破坏民族团结、制造民族仇恨和隔阂，给各族人民带来了沉重灾难，是我国稳定和发展的严重祸害，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敌人，必须予以唾弃和鞭挞。

三、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显著增强

步入近代以后，新疆各族人民在抵御外侮、争取中华民族独立和解放、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过程中，进一步深化了对各民族福祸与共、休戚相关的命运共同体的认知，各民族间的团结凝聚从自在走向自觉，以维护祖国统一为最高目标的爱国主义精神逐步成为新疆各族人民的心理认同。

辛亥革命前夕，伊犁革命党人通过创办《伊犁白话报》大力宣传民族平等，教育各族人民应不分地域，相互尊重；认为“中国自强”，各族人民都“可以为国出力，也可以保护这块土地”。在革命党人不懈的努力下，民族平等思想渐渐为各族人民了解，各族群众积极地参与到革命斗争中来。他们不仅捐款、捐物，而且直接参与革

命，汉、回、维吾尔、蒙古、哈萨克等各族人民积极参军，保卫革命成果。1929年，军阀割据之际，新疆回部八王上书国民政府：“我回族亦五族之一分子，国家存亡荣辱有关。敝部各王公将领爱国之心不后于人，一旦国家有事，愿征精兵贰百万，以备国防、援助政府而强我中华神州。”^①表明了回部八王对祖国的赤胆忠心。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人民纷纷拿起武器，同仇敌忾，与日军展开了殊死搏斗。1933年1月，在没有外援、四面受敌的情况下，一部分黑龙江抗日救国军、吉林自卫军、吉林救国军等假道苏联，奔赴新疆。1933年上半年，新疆先后接纳了3万多名东北抗日义勇军将士及其家属。义勇军进入新疆时，塔城至迪化沿途均设有接待站负责安排食宿，有的群众还自发准备丰盛的饮食招待义勇军。后来，这些东北义勇军大都参与到保卫新疆、建设新疆的事业当中。

中国共产党人进入新疆后，在积极协助盛世才完善、推行民族平等政策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新疆各族人民的抗日意识更是大大提高。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新疆各族民众同全国各族人民一道奋起反抗、共赴国难，共同谱写了可歌可泣的爱国主义篇章。在抗日战争中，新疆各族人民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为建设抗战大后方、开展抗日捐献、保障国际援华交通线畅通，作出重要贡献。

在新疆民众反帝联合总会文化部召开的十四个民族谈话会上，维吾尔、哈萨克、

资料链接

《伊犁白话报》，1910年3月25日创办于新疆伊犁惠远城（今新疆霍城），主要创办人是冯特民。《伊犁白话报》是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革命派为宣传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创办的报纸。该日报为四开小报，有汉文、维吾尔文、蒙古文、满文四种文版，是中国第一份多语种革命报纸，也是新疆第一份报纸。



^① 刘杰：《回部八王公爱国上书》，载《不能忘却的记忆——档案中的故事》，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0—31页。

塔塔尔、蒙古四个民族的代表表示“深切了解自己的利益和国家民族的利益是分不开的”^①。《新疆日报》对“中华民族”这一概念进行了大量宣传。中华民族“的确自有一种民族的生命力，内在而且长存，使他屹立宇宙间而不磨灭，不单是外来的侵略、便是无数的天灾人祸也皆抵抗过了”，“他们深切了解自己的利益和国家民族的利益是分不开的。因之他们都以迫切的心情和坚定的意志卷入在解放祖国斗争的洪流中”^②。通过这些文章的宣传和引导，新疆各族人民的国家意识和中华民族意识都得到了增强。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作为抗战大后方，新疆本着抗战高于一切、一切服从抗战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精神，以实际行动踊跃认购同盟胜利公债，补助抗战费用；完成征献军马1万匹任务；开展各种慰劳募捐运动，激励前方抗日战士奋勇杀敌。“抗战一日不停，吾人的募捐活动一日不止。”从1936年12月开始到1944年1月，新疆各族人民积极参加了募集寒衣、文化劳军、鞋袜劳军、民众防毒捐款等运动，援助抗战。从1938年开始，仅一年时间，全疆收到各族民众捐献的现金已达新币24.1亿两。新疆省政府用此款购买了10架战斗机，命名为“新疆号”，送往抗日前线。^③在普通百姓中也涌现出无数感人肺腑的事迹。温宿县西大庄维吾尔族农民巴海巴依临终前嘱咐儿子沙海将1000多块银元捐助前方抗日将士，以助前方多买几种枪弹，多杀几个敌人，好给我们中国报仇！^④哈萨克族妇女嘉义克知晓抗战捐助之事，毫不犹豫地捐出久存的一个50两元宝；迪化市的一位70多岁的汉族老太太在募捐现场，含着泪水摘下了自己的一对金耳环；喀什一位贫苦孀妇，捐献出自己一穗一穗拣来的一袋小麦；一位孤儿把院方发给他的一套新棉衣包捆好交给抗日后援会转给前方战士；一位汉族泥水匠在留言中这样写道：“爱国有心，捐款无力，仅将今天给人下苦所得省票3500两，捐3000两，留500两买两个饕充饥。”^⑤一位名叫艾沙的和阗贫民来到捐献处表示，苦于家贫无力捐款捐物，故“愿将一十

① 新亚：《抗战中的中国少数民族青年》，《新疆日报》，1942年5月5日第2版。

② 新亚：《抗战中的中国少数民族青年》，《新疆日报》，1942年5月5日第2版。

③ 共青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纪念馆等编：《新疆民众反帝联合会资料汇编》，乌鲁木齐：新疆青少年出版社1986年版，第30—31页。

④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局、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史地研究中心、《新疆通史》编撰委员会编：《抗日战争时期新疆各民族民众抗日募捐档案史料》，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90页。

⑤ 汪哮春：《抗战动员在新疆》，《新疆日报》，1938年10月9日。



新疆民众捐赠战斗机命名仪式现场

八岁之子于素甫捐送前防，以力抗战日寇，牺牲国家，以顺其愿”，“倘其子不忠实抗战，打倒日寇，即系不孝，如无该子，宁死不见子面”^①。以上这些都生动诠释了新疆各族儿女对祖国的热爱。

抗战中开辟的印度到新疆的国际驿运路线，曾一度是运送盟国援华物资的唯一通道。援华物资从印度发出，由几名内地青年学子和新疆百余名少数民族驮工组成叶城县驮运队，穿过湍急的河流，翻越喀喇昆仑山蜿蜒上千公里的高山通道，历经艰险运到叶城县，再运往前线，许多青年驮工为此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抗日战争中，新疆各族人民表现出强烈的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意识。祖国利益高于一切，自觉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尊严，成为新疆各族儿女永远不会忘记的历史记忆。

第四节 在困境中发展的新疆地区经济

民国时期，中国的社会形态依然属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时期，中国资本主义经济曾出现过比较明显的发展，但从总体上看，社会生产力的性质没有重大变化。在中国的社会经济生活中占优势地位的，仍然是封建经济。

这一时期，新疆社会动荡极大地影响了新疆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杨增新主政

^①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局、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史地研究中心、《新疆通史》编撰委员会编：《抗日战争时期新疆各民族民众抗日募捐档案史料》，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40页。

中华民族在长期发展中，曾受到过无数来自内部的矛盾与冲突和来自外部的挑战与威胁。中华民族一次次战胜灾难，一次次渡过难关，使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不断巩固和发展。在中华各民族共同开发和建设美好家园的长期奋斗中，不同的文化、宗教和习俗求同存异、开放包容，谱写了无数相互尊重、携手发展的千古佳话，培育了崇尚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一、刚强坚毅、自强不息等优良传统，形成中华文明的精神内核，成为中华民族繁衍生息、勇往直前的不竭动力。

时期，新疆政局稳定，在实业救国浪潮的影响下，轻工业取得一定的发展，初步建立了工业体系。盛世才主政新疆时期的两期三年建设计划，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人的有力推动下，新疆工农业有了一定的发展。国民党统治时期，新疆政局动荡，经济发展缓慢，通货膨胀，物价暴涨。张治中主政新疆时期，虽然制定了施政纲领和建设计划，但无法实现。至新疆和平解放前夕，新疆经济崩溃的局面已经无法挽救了。

一、内忧外患中的新疆地区经济

民国成立以后，协饷断绝，新疆财政陷于困境，收支几乎全由省内自行解决。为了摆脱财政支绌的局面，杨增新一面整顿赋税，一面印发钞票。1912年，新疆成立财政司，建立临时清理财政所，派人逐项查核新疆财政收支确切数据，以作为预算的依据，并核实各县正杂各税，明定章程，革除了清朝时期的一些积弊：颁发《征收粮草章程》，限制地方官对百姓的经济盘剥，免除捐款，严禁官卖蚕种，严禁苛索“鞋脚钱”等杂税，革除重复征收粮食贸易税和税收舞弊行为，禁止官员任意摊派税收等。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社会矛盾和阶级矛盾。

为了解决经济困难，杨增新“从实业入手”，陆续恢复了一些清末兴办的小型工矿企业，并在迪化等地创办了皮革厂、阜民纺织公司等，同时，提倡兴修水利，开垦荒地，于1915年设立新疆水利委员会，规划指导全疆的水利事业，开耕农田和园圃100多万亩。通过上述措施，新疆当时地方财政收入有所增加，但支出也在不断上升，入不敷出，连年赤字。为摆脱财政困境，杨增新大量印发纸币，造成货币贬

值，物价上涨，金银外流，“纸币充斥，物价又数倍往年……金融滞涩，进步毫无”^①。

金树仁主政新疆时期，由于大肆扩军，军费激增，使本已存在的财政危机更加严重。为了摆脱困境，金树仁拼命增加捐税，滥发纸币，印制并发行高达1.5亿两省票。同时，官吏贪污受贿、舞弊勒索之风越发严重。从1930年起，战乱迭起，大批农民流离失所，土地大量荒芜。据统计，因战争破坏被毁的土地达680万亩。与金树仁执政初期全疆1143万亩左右的耕地相比，有一半以上的土地都荒芜了，前期兴修的水利设施也同时被毁。这一切都使新疆各族人民的不满和怨恨日益强烈。金树仁上台不到三年，全疆就陷入了动荡和战乱。

盛世才执政后，拟订《整理财政计划意见书》，提出开源节流措施。开采阿山金矿、拜城铜矿等作为发行货币的备金和辅币；聘用苏联专家为财政顾问，对财政收支进行改革，设立了财政局，分布于全疆的14个主要城市，下设若干财政分局。在金融方面，改组省银行，成立财政监察委员会，颁布惩治贪污条例；与此同时，为解决公务人员的生活困难，1935年，成立“公务员合作社”，对公务员经济上加以补助。农业方面，在“实施农村救济”和“全省总动员努力春耕”的号召下，大力进行农业投资和建设，设法恢复和开垦因战乱而荒芜的土地，实行资金、籽种、耕牛、马匹的借贷，耕地面积逐年增加。同时在耕作方面，引进了苏联较为先进的技术，开始使用农业机械。在1942年盛世才投靠国民党之前，新疆地区的经济社会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帮助下，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和进步。

二、中国共产党人对新疆经济发展的贡献

1938年2月，毛泽民去苏联治病途经新疆时被留下工作，任财政厅副厅长、代理厅长。在党代表邓发的支持下，毛泽民大刀阔斧地整顿财政金融，努力开发建设。针对盛世才政府的财政弊病，他制定了“发展经济，培养税源，增加收入，保障支出，量入为出，争取收支平衡”的方针。其措施主要有两项。一是统一财政，健全财经制度。首先压缩财政厅编制，建立健全科室机构，并在喀什、和阗、阿克

^① 杨增新：《补过斋文牍·壬集下·电呈五年分中央专款力难增筹文》第2辑，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958—2959页。

苏等8个地区设立财政局，由省财政厅统一领导。制定收支总预算、三年建设计划和财经制度条例及其他规章制度，改变了过去财经工作混乱无序的局面，保证了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二是改组银行，统一货币。1939年1月，将新疆省银行改组为官商合办的商业银行，广招商



新疆省银行故址 位于新疆乌鲁木齐

股，巩固新疆金融，开展典当业，认购公债券。为了制止通货膨胀、稳定物价，改善人民生活，毛泽民说服了盛世才，对货币制度进行改革，将以“两”为单位的旧银票改为以“元”为单位的新货币，统一了新疆的货币。新疆商界同胞在《商界同胞拥护新纸币的宣言》中说：“新纸币的发行是政府在经济建设上的一种伟大收获，是我们新疆经济史上空前的统一币制的新纪元。”^①此外，1938年，毛泽民创办了新疆财经专修学校，专门培养财政干部和财会人员。

中国共产党人经过三年多的艰苦工作，轻赋税、重生产，把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整顿得井井有条，新疆财政状况由乱到治，不仅基本实现了收支平衡，而且偿还了过去所欠的大笔外债。财政状况的好转，有力地支持了各项建设事业，改善了各族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激发了各族人民的抗战热情，巩固了抗战大后方。

在苏联的援助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盛世才实施了第一、二期三年建设计划。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由于中国共产党人的勤奋工作，新疆社会经济发展非常显著。

在农业方面，伊犁、塔城、阿山、库尔勒、迪化5个地区，各建设1个农业畜牧业实验场，其所属各县均设立1个农机站；在全疆设立4个气候测量所；在南疆开浚农田灌溉主干渠20余处；建立中等农业技术学校1所。耕地面积有了进一步发

^① 《新疆日报》，1939年1月20日。

展，从1938年的587.5477万亩增加到1942年的958.1232万亩^①。林业方面，在迪化、伊犁、塔城3个行政区各设1个林业局，负责原始森林的开发，并进行植树造林。牧业方面，在北疆建立4个牧业局，成立割草站20处；在全疆组建种畜场30处，牛马羊禽实行品种改良；设立兽医院8处、兽医学校1所。工矿企业方面，利用原有的基础，进口先进设备，充实独山子油矿；在迪化、伊犁各建立1个面粉厂；公私合营建立热力发电厂3处，汽车修配厂2处；成立迪化自来水公司，头屯河铁工厂、阿勒泰金矿以及制革厂、印刷厂、煤炭工业各项计划，也都有相应的发展。

此外，在交通运输业方面，这一时期发展得也很快。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新疆成为通往欧洲的要道和中苏两国互相支援、彼此往来的桥梁。新疆的重要任务，就是在巩固抗战大后方的同时，保障国际交通要道的畅通无阻。为了完成这项任务，新疆全民动员，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加紧修筑公路，将迪伊公路（迪化—伊犁）向西延伸到中苏交界的霍尔果斯，将迪哈公路（迪化—哈密）向东延伸到星星峡与西北公路衔接。这条横贯新疆东西的公路对于保证把援助抗战的物资顺利地运往前线发挥了大作用。与此同时，新疆省政府按照三年建设计划，提倡民众修公路和桥梁，鼓励各族人民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省政府补助粮食和器材，并给予技术上的指导，修筑了额敏—塔城、迪化—焉耆、焉耆—阿克苏、阿克苏—喀什、喀什—和阗各线路。

资料链接

抗日战争时期，由于共产党人的勤奋工作，新疆社会经济发展非常显著。这一时期，新疆各地出现了一批近代企业。如1937年建成的有塔城电厂、伊犁电厂、伊犁印刷所、塔城印刷所、阿山印刷所、塔城五金器件修理厂、迪化面粉厂、伊犁面粉厂、伊犁食油加工厂、伊犁酿酒厂、绥定面粉厂、昌吉食品包装纸厂、迪化第一锯木厂、迪化第二锯木厂、伊犁锯木厂、伊犁肥皂厂等，1938年建成的有乌什电厂、阿山电厂、迪化第一印刷厂、迪化第二印刷所、喀什印刷所、阿克苏印刷所、迪化汽车修配总厂、伊犁汽车修配厂、迪化食油加工厂、塔城面粉厂、伊犁水磨面粉厂等。

^① 李溥霖：《十年来新疆的经济建设》，载《新新疆》第1卷第1期。

三、国民党统治下新疆经济的危机

国民党统治下的新疆，官吏腐败，社会混乱，贪污、赌博、吸毒盛行。为了维持庞大的官僚机构和军队开支，国民党新疆当局不断增加苛捐杂税，到1944年，“军马赋”



陆拾亿元纸币 1949年由国民党新疆省政府发行

“五一税”“户口税”“粮草税”等直接税竟达22种之多。张治中主政新疆后，制定了施政纲领、建设计划，但他的一套办法也根本无法实现。之后，麦斯武德、包尔汉先后执政，但新疆的财政经济已经全面崩溃。

为弥补内战造成的巨额财政赤字，国民党政府大量印发纸币，结果导致恶性通货膨胀，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当时的新疆省军费开支浩大，为了解决财政困难，国民党新疆省政府大量发行纸币。随后纸币面额越发越大，1947年12月发行面额为2000元省票，1948年12月发行3000万元大面额省票。1949年国民党新疆省银行甚至发行了面值为60亿元的纸币，是当时世界上面值最大的纸币之一。但据推算，这种60亿面值的纸币在当时只能买到0.06两大米，形同废纸。

第五节 革命文化的广泛传播

民国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给苦苦探寻救亡图存出路的中国人民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全新选择，社会主义成为时代潮流。在辛亥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俄国十月革命、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影响下，伴随着新疆各民族与祖国内地的深入交往、交融，新疆各民族文化向现代转型，各民族的国家认同和中华文化认同达到新的高度。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人入疆后，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革命进步和民族团结的思想蓬勃发展。这一时期，新疆各族人民与全国各族人民同仇敌忾，对中华文化的认同达到新的高度。

一、民国时期新疆地区文化的发展

清末新政使新疆的新式教育兴盛一时，但短暂的新气象并没有完全改变教育落后的面貌。杨增新主政新疆时，唯恐“开通民智”，使得新疆地区国民教育发展缓慢。从1916年起，新疆开始设立少量的学校和各种短期训练班性质的研究所，创办了第一所女子学校——迪化县立女子国民学校。1924年，迪化成立省立俄文法政专门学校，这是当时新疆的最高学府，入学学生有汉族、回族、维吾尔族、满族和锡伯族等，课程包括俄文、刑法、宪法、国际法、世界语等。该校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新疆地区高等教育的发展，特别是培养了一批急需的俄语翻译人才。金树仁基本上承袭了杨增新的政策和制度，在“开办教育，疏通民智”的口号下，文化教育比杨增新时期略有好转，如南疆地区推广汉语教育，改编旧教材，统一使用国语教科书；开办6所女子学校、创立男女合校制度；派遣学生赴内地和国外学习等。虽然金树仁在文化政策方面较杨增新稍显积极，但是由于其主政期间吏治腐败、财政崩溃、民族矛盾激化，教育总体落后的状况依然如故。

总的来说，杨、金时期新疆的文化教育趋于保守、虚化，在曲折中缓慢前行。但杨增新本身对守旧儒家道统的认可和推崇，使得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传统文化在新疆各地的影响加深。

盛世才“亲苏”后，一批苏联技术人员、专家以及中国共产党人来到新疆并被安排在重要部门。1936年，盛世才制定了“六大政策”，成为其施政纲领和政治路线。在此过程中，1934年的“八大宣言”中提出“扩充教育”，1935年在“九项任务”“十大纲领”中提出“提高文化”，并采取了相应举措，使全疆各地的文教事业有较大进步。各县普遍创办县立小学，鼓励各民族适龄儿童上学接受教育。1942年，全疆小学学校达7 091所、在校生71.26万人，比1934年增加了2.7倍。从1935年起省立师范设立了维吾尔、哈萨克、蒙古等民族班。同年冬天，又在迪化成立了编译委员会，编译少数民族文字课本。1935年，成立了新疆第一所高等学府——新疆学院。从1934年起，省政府派遣青年去苏联学习政治、经济、法律以及农牧、医学等科学技术。苏联中亚国立大学设立了行政法律系，专门培养来自新疆的官费留学生。1936年7月11日，迪化公园举行了欢迎第一批留苏学生归国大会，这批归国留学生共90名，包括维吾尔族40名、汉族24名、回族9名、哈萨克族10名、蒙古



新疆学院教职工、学生欢迎林基路教务长合影留念

族5名、锡伯族1名、达斡尔族1名。来自全疆各地不同民族的学生接受教育深造，学成回国后对新疆各领域建设发挥了积极作用。

民众晚会因俱乐部的兴建而兴起。各文化促进会大多有自己的俱乐部，用于举行集会、演讲、话剧比赛、放映电影等。俱乐部的修建及成立相当迅速，仅1938年，迪化就新建俱乐部五六所。民众晚会的内容包括政治报告、反映新疆社会在“六大政策”指导下取得的成绩、提高各民族的文化水平与政治认识，有话剧、双簧、戏剧等多种多样的形式。此外，还适时插入歌舞、音乐、魔术及其他节目，尽量避免千篇一律。^①

1935年，迪化有线广播电台正式设立，成为新疆文化传播迅捷的媒体工具。1938年底，电台不仅在迪化播音，而且能够扩大到外县，还可以转播南京国民政府的广播节目。相比之下，广播电台的播放内容更加丰富多彩，因此吸引了大量听众。由于广播具有传播便利、不受听众文化程度限制的特点，在很大程度上扩展了新疆各族人民的知识面，成为唤醒和激励民心的有力工具，爱国主义情怀与中华民

^① 新疆日报社：《谈谈民众晚会》，《新疆日报》，1939年5月3日第4版。

族精神在新疆得到更加广泛的弘扬。

另外，西北文化建设协会设在迪化的编译馆，出版汉文、维吾尔文两种版本的《天山画报》和《文摘》《少年知识》《天山文艺小丛书》等，对各民族普通群众开展文化知识普及。电影事业迅速发展起来。巡回文化工作队携带影片、图片、汉文维吾尔文书报杂志到全疆各地放映、展览和口头宣传。西北文化供应社成立后，迪化、兰州都设有发行所，大量供应内地新版图书，受到各族群众的欢迎。新疆歌舞团也到南京、上海、北平、台湾等地演出，博得好评；同时，一些音乐团体与音乐人士被邀请来到新疆演出，盛况空前。

民国时期新疆多民族文化的发展，客观上激发了新疆地区各界民众的社会责任感，使其国家意识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得到觉醒与增强，如抗日募捐、撰写慰劳信等运动中，新疆各族人民表现出极高的政治热情。同时，良好的社会氛围有助于提高社会民众的整体素质，营造出各民族团结向上的社会环境。

二、中国共产党引领下新疆文化的新风貌

中国共产党人在各个领域积极宣传马列主义和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的政治主张，在进步人士齐心协力、密切合作下，新疆的文化出现前所未有的新成就、新气象、新风貌。

中共中央选派的干部来到新疆以后，很多被分配在行政、教育、新闻等部门以及民众团体担任领导职务，积极开展新文化运动，传播马列主义和进步文化。《新疆日报》是新疆影响最大的报纸。从1938年初到1942年9月，新疆日报社的主要领导都由汪小川等中共党员担任，他们负责采稿、编审、出版等工作。《新疆日报》刊登的内容包括中国共产党及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日主张和功绩，延安大量的红色电讯，中共领导人的文章，苏联及世界反法西斯阵营的消息等，并以社论的形式号召全疆各族人民团结一致，坚决抗日，支援前线，建设新新疆。此外，新疆日报社还代售《新华日报》及其他进步书刊，设立伊犁、塔城等6个分社，健全了通讯发行网。《新疆日报》以其鲜明的立场、公正的立论，唤醒了各族人民特别是广大青年的阶级意识和民族自觉，使许多民众了解和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战文化主张和马克思主义思想。新疆日报社还通过翻印毛泽东著作《论持久战》以及中国革命史

和一些政治经济学书籍等来传播革命进步思想。《反帝战线》《新疆妇女》《新疆青年》等进步刊物，也成为中国共产党人传播马列主义、宣传抗日救国思想的舆论阵地。

1939年，迪化文化书店公开出售《资本论》《列宁选集》等马列著作以及普及马列主义的读物。1939年至



新疆民众反帝联合会会刊《反帝战线》书影

1941年，在共产党人和文化名人张仲实、茅盾（沈雁冰）、杜重远的支持和指导下，新疆学院师生共同主办综合性的进步刊物《新芒》，刊登了许多宣传研究马列主义的文章和译文。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救国宣传中，文化艺术活动亦起到积极作用。1939年4月，新疆文化协会在各族文化促进会的基础上成立，推举茅盾为文化协会委员长兼艺术部部长。新疆文化协会成立后，开展了以自由和进步为主题形式多样的活动，如举办文化干部训练班讲授新哲学、戏剧理论、音乐、美术、舞台技术、化妆等知识，培养各族艺术人才，编译汉、维吾尔、哈萨克、蒙古四种文字的小学教科书，以提高各民族群众文化水平。1939年，在茅盾的帮助、指导下，赵普林等创作的话剧《新新疆进行曲》成为新疆第一部反映本省现实生活和以抗战为题材的大型话剧，对新疆戏剧发展起到很大推动作用。1939年8月，著名文艺工作者赵丹、徐韬、王为一、叶露茜、俞佩珊等人来到迪化，加入新疆文化协会，成立了“新疆实验剧团”，在新疆上演了许多优秀的戏剧作品，其中反映抗日战争的剧目《故乡》《突击》《血祭九一八》《劳军》等上演后，收到很好的效果。新疆的革命形势吸引了内地广大青年和知识分子纷纷涌入，文化界民主、自由、救亡的气氛空前浓厚。

在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的带领下，新疆的教育进入快速发展时期，不仅学校数量增加了，而且师资力量、教学质量也有很大提高，新疆的文化教育事业令人耳目一新。

林基路在担任新疆学院教务长期间，面对学院只有政经系、教育系、语文系、高中部，学生百余人，教育质量差，课程不系统等落后的现状，采用了延安抗日军

政大学的办学方针，整顿校风校纪，制定了“团结、紧张、质朴、活泼”八字校训；教学上提出“学用一致”的方针，改革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聘请中共党员和社会进步人士讲授《新哲学》《中国革命史》《世界革命史》《辩证唯物论》《军事学》等课程，举办了“政治经济学”“社会发展史”等专题讲座。林基路教育学生要关心国家和中华民族的命运，引导他们投入火热的抗日救国运动中去，还在教师中倡导理论联系实际的新工作作风，组织学院师生大唱抗日救亡歌曲，举办抗日救亡演讲会，使当时的新疆学院成为各族革命青年抗日革命活动的中心。1939年1月，著名民主人士杜重远应邀来新疆，担任新疆学院院长。在共产党人和爱国进步教员的培养和影响下，新疆学院的学生成为社会中最活跃的一部分，大批有志青年学生很快成长起来并走上革命道路。

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新疆教育界，引导大中小学生走出课堂、校园，积极投身于各项抗日救国运动，深入街头巷尾动员民众参加冬学和识字运动，使教育普及进一步扩大到全疆社会各阶层。1938年7月，共产党员朱旦华（本名姚秀霞，参加革命时改为朱家农）担任省立迪化女中教导主任期间，制定了新型的教学方案，语文、历史、政治课选用了具有革命思想、符合抗战需要的教材，许多课文选自延安使用的课本或者使用延安报刊登载的文章。一批女性骨干教师利用课堂教学、课外谈心、开会等各种方式，向女学生和妇女宣传十月革命与抗日救国的道理。特别是女校师范班的学生，深入街头巷尾号召女性学习文化知识，有的甚至去担任民校教师帮助更多的女性读书识字，并以实际行动组织义演等活动，为抗日筹集资金。

为了团结各民族中的知识分子、青年和民众，自1934年始，新疆陆续成立了包括12个民族的9个文化促进会。到1936年，全疆各专区及许多县都有各族文化促进会的组织。各族文化促进会先后在联共与中国共产党人的直接领导下，为发展各民族的文教事业、宣传抗日救亡，特别是在各族基层群众中传播中国共产党的各



茅盾（1896—1981），原名沈德鸿，字雁冰，浙江桐乡人。中国现代著名作家、文学评论家、文化活动家以及社会活动家。1939年1月，应杜重远的邀请赴新疆，任新疆学院教育系主任并兼新疆文化协会委员长。

项抗战政策和理论思想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1943年，维吾尔族文化促进会为抗日捐献4架飞机；回族文化促进会从留苏回国的回族学生和回族干部中，聘选40多名宣讲员组成宣讲团向民众进行抗日宣讲；汉族文化促进会利用话剧、京剧、秦腔、花鼓以及民间社火、电影放映等灵活多样的艺术形式，为抗日救国奔走呼号。1939—1940年，焉耆县汉文会多次举行抗战歌咏比赛，《大刀进行曲》《游击队之歌》等由此广为传唱。义演募集捐款是汉文会支援抗战前线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又一形式。另外，各民族文化促进会纷纷成立自己的剧团、歌舞团。1937—1942年间，新疆各地的中国共产党人利用文化会的组织和剧团、学校、演出队，做了大量抗日宣传及无产阶级的启蒙思想教育工作。夏衍、萨空了等全国知名文化战士来疆后，利用文化会的组织从事抗战与促进文化教育工作；维吾尔族爱国诗人黎·穆塔里甫在其创作的诗篇《中国》中这样写道：“中国！你瞧，我们就是这样驰骋在你的土地上，每一分钟都在保卫着你，争取你的未来！在世界上要建立起唯一的、崭新的、独立的新中国！”新疆各族人民紧密团结，个人责任与国家命运成为时代的主题。

1934年8月1日，新疆民众反帝联合会成立。中共驻新疆代表选派富有革命经验的干部对其进行改组、整顿。每逢重大纪念日，反帝会都组织民众举行大规模的宣传活动，同时还印发了多种文字的大纲、讨论提纲和专题小册子，在普通民众中深入宣扬抗日主张。

中苏文化协会新疆分会是这个时期在新疆传播马列主义的另一个重要团体。该协会成立于1939年11月5日，在伊犁、塔城和阿勒泰均设立分会。中苏文化协会新疆分会从成立到国民党势力进入新疆地区，通过介绍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和文化生活、传播马列主义思想，在意识形态和思想观念方面对新疆社会文化产生了很大影响。

中国共产党人和爱国民主人士通过各种文化形式向全疆各民族宣传进步思想，不仅唤醒了民众的觉悟，增强了新疆各民族对中华文化与中华民族的认同，还使他们深刻地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人民抵抗日寇、维护祖国统一的核心力量，进一步激发了新疆各族人民反抗军阀、投身革命、争取解放的勇气。

第六节 以伊斯兰教为主、多种宗教并存格局的延续

民国时期，我国已经逐步形成了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等五大宗教并存的格局。这一时期，新疆依旧延续着以伊斯兰教为主、多教并存的宗教格局。受“泛伊斯兰主义”错误思潮的影响，伊斯兰教与其他宗教的关系出现过短暂的紧张局面，但并没有改变新疆多种宗教和谐共处、交融共存的主流。

一、伊斯兰教、佛教、道教等宗教的进一步演变

民国时期，因“泛伊斯兰主义”错误思潮的大肆渗透，新疆正常的宗教活动遭受严重破坏。19世纪末20世纪初，“泛伊斯兰主义”分子窜入新疆，打着传播宗教的幌子，以念经为名，在喀什、英吉沙、和田、阿克苏、库车、吐鲁番、鄯善、哈密等地从事分裂活动。20世纪初，到土耳其、中亚等地留学的新疆青年也成为“泛伊斯兰主义”分子渗透的对象，他们中的一些人彻底演变成了帝国主义势力分裂中国、进行颠覆活动的代理人。

民国时期，藏传佛教在蒙古、满等民族中仍有较多的信众，而信仰佛教其他宗派的信众人数已经较少。这一时期，信仰道教的多为汉族群众。新疆的道教与内地一样，呈现出诸教杂糅的形式。比如，在1918年呼图壁县第一任县长张衍耀主持重修的真武阁中，南有财神，北有如来佛像，庙内脚踩龟蛇的却是道教真武大帝。茅盾在《新疆风土杂忆》中记载：“但今日之新疆，则除蒙族之喇嘛外，更无佛徒。汉人凡用和尚之事，悉以道士代之。丧事中惟有道士，而佛事所有各节目，仪式多仍其旧，惟执行者为道士而已。”^①由此可见，这一时期新疆道教的神祇系统也十分开放与包容。

^① 茅盾：《茅盾文集·新疆风土杂忆》下，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235页。

新疆全面贯彻国家宗教信仰自由的宪法原则，既尊重信仰宗教的自由、又尊重不信仰宗教的自由，决不允许在信教和不信教、信这种教和信那种教、信这一教派和信那一教派群众之间制造纷争。新疆始终坚持各宗教一律平等，对所有宗教一视同仁，不偏袒某个宗教，也不歧视某个宗教，任何宗教不得享有超越其他宗教的特殊地位。新疆始终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信教群众和不信教群众享有同等权利、履行同等义务，无论什么人、哪个民族、信仰什么宗教，只要违法，就必须依法处理。

二、外来宗教的传入及伊斯兰教中国化的进一步发展

20世纪初，在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殖民侵略进一步加剧的背景下，天主教、基督教（新教）、东正教也加大了在新疆地区的传播力度，其中较有影响的传教组织包括瑞典传教团（主要在喀什活动）、中国内地会（英国人创立）等。这些组织除传教外，最主要的任务就是为帝国主义的殖民侵略活动提供情报搜集等服务，最终被当时的新疆省政府所驱逐。

天主教是基督教三大教派之一。民国初年，新疆的宗教政策一度相对宽松，天主教的传教活动较为活跃。从1920年到1935年，新疆天主教徒人数从300多人增加到700多人。1938年，新疆省政府查明天主教传教士存在窃取新疆情报等事实，遂对这些天主教传教士进行驱逐和拘押，暂时中止了天主教在新疆地区的传播。国民党统治时期，天主教曾再次进入新疆，但是影响甚微。

民国时期，大批基督教（新教）传教士陆续进入中国。喀什的瑞典传教团和中国内地会经过长时间活动，传教组织已有相当规模。国民党统治新疆后，乌鲁木齐还成立了新疆中华基督教会。由于瑞典传教团和中国内地会屡屡出现窃取情报、煽动分裂的行径，因此这两个传教组织被新疆省政府最终取缔。

东正教随着俄罗斯人的迁入而传入新疆。中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签订后，沙俄取得了在新疆的传教权。俄罗斯传教士在俄罗斯人聚居的地方开设教堂，到十月革

命前，乌鲁木齐、伊犁、塔城、阿勒泰、喀什等地都建立了东正教教堂。但东正教在其他民族中没有取得较大进展。

无论是北洋政府还是南京国民政府，都始终坚持政府管理宗教事务、宗教不得干预政治等基本原则。即使处于战乱动荡之中，新疆省政府也对那些打着宗教旗号制造教派冲突、煽动民族仇恨、妄图分裂新疆的行径进行了坚决打击，并对那些以传教为名、企图攫取新疆利益的境外势力进行清除。如杨增新主政时期，就对“泛伊斯兰主义”始终保持警惕，并采取措施严加防范。“所立道堂并此外访问所未及者，一律封禁，一面出示晓谕。嗣后只准到礼拜寺诵经，不准再设道堂。”^①“只准到礼拜寺念经，……不准私开道堂，昼伏夜动，并在堂或在家聚众念经。如系本人在自己家内礼拜，只准一家之人围聚，不准广招外人。”^②此外，杨增新还严禁外籍人在新疆私办学校、充当教习和非法到各地清真寺诵经传经，禁止他们私下与新疆伊斯兰教信众往来。

民国时期，随着内地回族的大量迁入，新疆地区的伊斯兰教受儒家文化的影响进一步加深。这期间，一批爱国宗教人士十分重视“以儒诠经”，专门开设了国学、



新疆莎车县清真寺里的莲花图案 体现了新疆地区多种宗教交融共存的特点

① 杨增新：《补过斋文牍·辛集三·训令喀什朱道尹查禁缠民艾买提等设立道堂文》第3辑，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673页。

② 杨增新：《补过斋文牍·辛集三·通令各县查禁缠回私立道堂文》第3辑，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668页。

国史等必修课程，强调中国伊斯兰教信众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面对“泛伊斯兰主义”错误思潮对新疆地区信教群众的毒害，爱国宗教人士公开揭批宗教极端和民族分裂分子的歪理邪说，为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作出了贡献。

民国时期，无论是“泛伊斯兰主义”等错误思潮的冲击，还是受帝国主义列强殖民扩张而进入新疆的天主教、基督教等的影响，都没有改变新疆地区多种宗教并存的格局，也没有改变多种宗教吸收融合、平和包容的关系和中国化的根本方向，交融共存始终是新疆地区宗教关系的主流。

学习思考

1. 为什么说新疆从来就不是“东突厥斯坦”，更不存在什么“东突厥斯坦国”？
2. 举例说明民国时期新疆各族人民共同抵御外侮、维护国家统一、反对民族分裂的爱国主义事迹。
3. 在中国共产党的引领下，民国时期新疆的文化展现出了哪些新风貌？

必读书目

1.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1921—1949）上下册，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第2版。
2. 张海鹏、翟金懿：《简明中国近代史读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
3. 李新总编：《中华民国史》，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
4.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疆的若干历史问题》（2019年7月），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